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典范价值

刘丹

(中共德阳市委党校, 四川 德阳 618000)

【摘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现实问题。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在实践中坚守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原则、尊重了中华民族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直面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不仅为全人类提供了一种有效处理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中国方案”,更在事实上创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具体有效实践,具有鲜明的典范意义,为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有效锚点。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现实问题。“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是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的独特表达,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乡头城尾”的关键节点。当前,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释放了巨大的积极价值,具体体现了坚守基本理论、尊重特殊历史、直具体现实的价值内涵,在事实上创造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实践,具有鲜明的典范意义。

一、坚守“城乡融合”理论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理论突破了资本主义对城乡矛盾的障碍,“全面探究城乡对立的根源和局限性,开创性地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必然性。”^[2]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和现实中选择了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继承和丰富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

(一) 马恩城乡融合思想的基本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明确使用“城乡融合”概念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提出:“……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3]即“城乡融合”是对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分工而产生的城乡对立的具体批判。“城乡融合”的基本价值至少包含了四部分的内涵:一是城乡发展的价值和谐。城乡融合将在公有制的基础上重新搭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共同价值。在公有制条件下,生产的本质追求都是和谐美好的生产生活状态,这样条件下城乡关系应当是共生共美的,在良性

互动中实现共同发展;二是城乡主体价值平等。“如果说城市工人比农村劳动者发展,这只是由于他的劳动方式使他生活在社会之中,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方式则使他直接靠自然生活。”^[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的“工农结合”正是要求乡村和乡村居民的各项权利不断回归与城市和城市居民平等;三是城乡发展的空间互补。社会主义呼吁人类打破传统的城乡关系,建立有机的互动空间,不仅“以工促农”,也要“工农互助”,要求城市和乡村之间发展的双向驱动,城乡要素合理均衡,城乡人口有序流动,以创新的机制撬动和统筹城乡在时空二维的合理重构;四是城乡间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有必要打破以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乡村产业和乡村人口发展的传统思路,凸显乡村和乡村人口的自主性、内生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乡村在生态活动中的优势,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二)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中国坚持

中国共产党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至今一以贯之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在短时间内恢复了城乡生产的现代秩序,初步搭建了城市和乡村在工业化早期的生产角色。农村的所有制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幕,“三农”生产力得到了初步有效的解放,党和国家因之制定了一系列惠农促农政策,极大扭转了城乡关系的二元对立状况。但宏观来看,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依旧落后,城市工业对乡村农业的剥夺仍然严重,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低下严重掣肘了城乡的现实融合发展。党的十九大首次把“城乡融合发展”写进党的文献,“(农村改革)通过乡村振兴,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5]这一时期的城乡关系开始突破乡村对城市单向一维的支出,以乡村振兴为契机

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效探索了农村向度的发展动力，这不仅是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收获，以此为起点的新型城乡关系必然是城乡融合发展的。

二、尊重“县域衰落”历史遗憾

尊重历史，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中国古代封建历史时期的“县”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单元，凝聚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特色，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坚持了人民立场，充分回应了县域的关键价值，对“县域”的角色进行了有效的现代化调试，重新激发了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动能。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县域的衰落

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县的转变最终导致当前“县城”的尴尬存在，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代价和遗憾，本质是农业和工业的矛盾。

第一，县域是维持农耕时代封建王朝的关键运行。中国的县经历了郡县制、州县制、行省制等制度的发展而保持了长期存在，其逻辑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兼具土地密集、劳动力密集和生产边际率低下特征，在广袤且分散的乡镇为生产单元的农业活动和中央集权之间必然需要一条统合的机制，郡县制正是在此条件下生成。因此，县的职能满足了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双重诉求。

第二，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县城表现了尴尬的衰落。现代工业生产方式要求生产部门需要尽可能地体现聚集效应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新中国效仿苏联模式，通过行政区划改革将中国传统的“县—乡”结构调整“城—县—乡”三元，这虽然为城市工业生产提供了最初的生产资源，但是实际导致了县域在社会生产中不上不下的尴尬。改革开放前，政府主导的县级层面行政区划调整的主线是“切块设市”与“省（地区）直管县”体制并行。^[6]1959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拉开了“市管县”的序幕，之后县级单位的行政职能下降，生产能力被削弱，县域的传统社会生活也被打破。宏观来看，这一时期全国的社会活动都服务于工业化建设，所以在此条件下形成的城乡关系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

（二）直面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遗憾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明确了县域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角色。当前，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方兴未艾，我国主要采取“试点+推广”的方式，希望通过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

现实条件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县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现实价值。

第一，振兴县域经济能力。振兴县域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改革的重点。从过程来看，以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体现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经济主体再造；第二阶段主要体现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宏观体制变革。^[7]

第二，重塑县域文化角色。郡县制在我国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县”以及行政单位历来是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空域，凝结了丰富的习俗和传统。具体来看，县域起码在两个方面扮演了重要的“乡土性”文化角色。其一，“农民”身份。从户籍识别的角度看：“县”作为长期存在的行政单位，我国历史上的户籍识别都是以“县”为标准的，而我国当前宪法省、县、乡三级制行政区划也以“县”作为户籍识别的主要层级^[8]；其二，独特的“县城文化”。我国当代所谓的“县城文化”，其基本形象大体是落后、保守和封闭的，这一方面是落后的经济社会生产力决定的，也是更为强势的城市文化一再侵蚀而塑造的，这绝能以“城乡差异”或“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一语蔽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县城文化理应受到更多关注。

第三，再造县域社会空间。县域社区在外表上已经具备了现代性的基本样态，但实质上还呈现着浓厚的“乡土本色”。以涂尔干所言，传统农村社区人口结构属于“有机团结”，传统的城市社区人口结构则属于“机械团结”^[9]。这直接展现为县域内居民社会生活的直观表征，即“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共存，这本质上也是传统和现代在居民社会生活领域的对话，现代城市工业文明不断塑造着县域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的生活样态。在此过程中，县域内社会空间也因现代性的深化而激烈重构。

三、直面“城乡差距”现实矛盾

城乡差距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而解决城乡差距的关键在于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其实践的落脚点就是推动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

（一）正确认识“城乡差距”的角色

对城乡差距的准确认识，本身就是直面现实问题的智慧和勇气。首先，中国共产党高度正视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最大的发展不充分这一重大社会现实。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对城乡差距的关注聚焦于“如何正确认识城乡关系”，大体形成了四种主要观点：“城乡互补”，主张调整城市和乡村的角色关系，实现“以工补农”“城市反

哺乡村”^[10]；“乡村转型”，希望以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以至于缩小城乡差距^[11]；“城乡依附”，认为乡村依附于城市，要限制城市资本下乡、保留农民返乡退路，从而保证乡村的“压舱石”作用^[12]；“城乡统筹”，分析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逻辑，认为城乡统筹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13]。但无论如何，我国推动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在于直面和解决城乡差距，进而以更积极的角色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其次，二元理论模型并不足以解读我国的城乡差距。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仅将城乡关系理解为纯粹的“二元对立”，无疑是脱离实际的简化。特别是在我国复杂的城乡关系变化中，不仅蕴含了时间维度的历史变化，也蕴含了空间维度的区域差别，可以说我国的城乡问题绝非一个停留在二维平面空间内的单向度问题。城市和乡村作为独立的单元，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缺乏互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只有在交往和互动中才能产生变革和发展的诉求：即县域在客观上是我国政治文化的历史表达，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现实选择，且“县域”撑开了作为主体的人在城乡之间交往的现实场域，是城乡之间最积极活跃的要素互动过程，存在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二）着力解决“城乡差距”的具体矛盾

城乡融合发展既是解决城乡差距的目标，也是其路径和过程，缩小城乡差距，抓手在县城。具体来看，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在实践中就是以推进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第一，立足城乡融合发展，把握县城发展的现实痛点。以县城视角，准确把握了县城发展的现实痛点，具体看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发展定位不清晰；二是发展势能总体较低；三是公共服务能力较低；四是发展成本较高，潜在风险较大；五是联动能力较低。

第二，布局顶层设计，提供有效实践举措。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对解决县城发展痛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和宏观布局，具体提出两个阶段目标：第一阶段，到2025年，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补齐县城短板弱项，具体建成一批补足公共资源配置、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市政设施完备，公共服务全面、人居环境改善，综合承载能力突出，农民到县城就业安家规模扩大，县城居民生活品质改善的条件较好、优势明显的示范性试点县城；第二阶段，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成各具特色、富有活力、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县城，与邻近大中城市的发展差距

显著缩小，促进城镇体系完善、支撑城乡融合发展作用进一步彰显的两个阶段总体目标。并有针对性地设计三十五条指导方案，拉开了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的大幕。

四、结语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体实践中，必须行之有力地综合审视“中西”和“古今”的争论，必须对具体体现存的实在物进行现代性重塑。这个重塑过程必须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尊重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条件、直面中国现代化进程矛盾的现实有效关切。作为一种思路，梳理我国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逻辑，不难看出其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实践化的典范，也是对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有效现代化改造，更是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具体矛盾的有效应对，以此不难抽象出一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逻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N]. 人民日报, 2023-06-03(01).
- [2] 李红玉.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20, No. 239(05).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89.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259.
- [5] 习近平.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42-44.
- [6] 殷冠文, 刘云刚. 区划调整的城市化逻辑与效应 [J]. 经济地理, 2020, 40(04): 48-55.
- [7] 张凤林.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J]. 理论探讨, 2022(03): 167-172.
- [8] 陈艳芳. 户籍身份转变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追踪数据的PSM-DID估计 [J]. 调研世界, 2017, No. 291(12): 37-42.
- [9] 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 [M]. 渠敬东,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89-91.
- [10] 陆学艺.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6(9): 28-35.
- [11] 徐勇. 阶梯性社会与“三农”的提升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6): 30-32.
- [12] 贺雪峰. 如何理解现阶段中国城乡差距——兼与叶兴庆、李实商榷 [J]. 社会科学, 2022, No. 502(06): 137-145.
- [13] 蔡昉. 城乡统筹发展: 理论和历史的解释 [J]. 中国乡村发现, 2010(13): 28-31.